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书社

译注 王绍曾 刘心明

审阅 周勋初

谢灵运鮑照

诗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谢灵运

鲍照

诗选

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黄云生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郭海宁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谢灵运鲍照诗选译

刘心明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128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南北朝时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长久对峙。在这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代里，由于北部中国战乱频仍，北方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具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汉族士大夫及广大人民大量南迁，南朝便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时仍继续在江南延展着。这一时期，显示着整个中国诗歌发展趋势的，乃是南朝诗人的创作。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美自然的山水诗、托古讽今的乐府诗和生动热

情的民歌，从而打破了玄言诗对中国诗坛的百年统治，把东晋以来衰颓的风气重新振作了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两位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大作家：山水诗人谢灵运、乐府大家鲍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一带）人，晋车骑将军、康乐县公谢玄之孙。他出生在会稽郡始宁（今浙江省上虞县南、嵊县北），十五岁时袭封康乐公。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灵运二十一岁，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开始步入仕途。其后追随抚军将军刘毅，任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等职。刘毅起兵反抗刘裕，兵败自杀。灵运改任刘裕的太尉参军、秘书丞、中书侍郎等职。义熙十四年，刘裕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建宋国，灵运任黄门侍郎、从事中郎。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建宋朝，改元永初，东晋灭亡。灵运由公爵降为侯爵，改任太子左卫率。由于灵运并非刘裕的嫡系亲信，又曾经为刘裕的死敌刘毅效力，因此根本得不到刘氏王朝的信任与重用。灵运的祖父谢玄，虽然功勋卓著，官爵显赫，但他却是东晋王朝的重臣。而刘宋王朝正是篡夺了东晋王朝的江山而建立的，它的统治者们，对前朝功臣的后代，也自然要另眼看待。所以，朝廷只是给灵运一

些官阶虽高却无实权的职位，“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宋书·谢灵运传》）。而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同上）。永初三年，刘裕死，少帝即位，朝政被权臣徐羨之、傅亮等人所把持，灵运仍然被冷落一旁。他就“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同上）。因此，为徐、傅集团所恶，出为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太守。任职仅一年，便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这次遭贬滴，从政治上来看，无疑是对灵运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从诗歌创作方面来看，却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仕途的绝望与无可奈何，使灵运出世隐逸的思想开始露头，他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林野，想借此来逃避现实，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消极反抗。这时，他创作了大量清新优美、摹景抒情的山水诗篇，如《过始宁墅》、《登池上楼》、《游南亭》、《初去郡》、《七里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七里瀨》一诗中写道：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
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瀨，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正是灵运这一时期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关于灵运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及创作情况，《宋书·谢灵运

传》中也有比较客观的记述：“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杀徐羨之、傅亮、谢晦等人，灵运被召回京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任秘书监、侍中等职，但仍无实权。于是他也依然同在永嘉一样，擅离职守，肆意遨游。文帝得知，叫人放出话来让他辞职。灵运就托病回始宁，第二次开始隐居生活。这时期的代表诗作有《入东道路》、《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石门岩上宿》等诗。元嘉八年，灵运的仇人、会稽太守孟顛诬告灵运有反叛朝廷的“异志”，灵运急忙赶到京城为自己申辩。宋文帝没有追究灵运的罪名，但也不愿再让他重返始宁，而是派他出任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西）内史。灵运在临川仍旧到处游山玩水，不理政务。这时期他写下了《道路忆山中》、《入彭蠡湖口》、《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等好诗。由于当地官吏的检举，朝廷派人前来逮捕灵运。灵运兴兵反叛，兵败被擒，被流放到广州服刑。元嘉十年，灵运又被控告里通村民，图谋造反。宋文帝下令在广州将他处死。灵运死时年仅四十九虚岁。

在这短暂的几十年中，谢灵运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诗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祖。在灵运之前，虽然也出现过以山水诗为衬景的杂诗，如晋初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和左思的《招隐诗》，都写到了山林泉石之美；晋宋之际的谢混，在其《游西池》一诗中也曾写出了“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这样清新优美的诗句。但是，这些诗歌中描山摹水的文字，还只是一种点缀与衬托，并不是诗中的主要成份。到了谢灵运，才第一次把自然界的山水林泉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来进行描绘，歌咏山水之美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而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就寄托在客观的山水景物之中了。

当然，灵运的诗歌作品，也不都是山水之作，抒写情怀、阐扬道理的诗篇也不在少数。如叹息人生易老、生不逢时的《岁暮》、《豫章行》等诗；歌颂友情的《南楼中望所迟客》、《庐陵王墓下作》等诗；抒发诗人的隐逸之志、阐扬道家清净无为的处世思想的《斋中读书》、《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等诗。不过，最能代表灵运一生的创作成就的，还是他的山水诗。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诗歌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以情写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

诗人在描摹山水的时候，擅于把胸中所含的丰富的情感，通过笔墨渗透到字里行间，使诗中所描绘的客观的自然景物蒙上一层浓重的感情色彩，使人读其诗即见其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中写道：“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从这几句对客观景物的描写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又如《七里瀨》一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则是通过对肃杀的秋景的描写，来暗示诗人遭到贬斥后的那种落寞忧伤的情绪。清人王夫之说谢灵运的山水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可以说是十分恰切的评论。

二、风格清新自然。

灵运的《石门岩上宿》一诗中写道：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

这几句写得淳朴自然，颇堪玩味。尤其是“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两句，更是自然清新，浅近如口语，

为历代诗评家们所称道。这种清新优美、自然可爱的诗句，在谢诗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等，大都脍炙人口，足以垂范后世。

不过，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却不是不假思索、信手写来就能达到的，而是必须讲求技巧，努力避免直白浅露，经过一番文字的锤炼，而后求得清新自然。

虽然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几乎每首诗的后面都拖着一条谈玄说理的尾巴，大大地损害了山水诗恬淡自然的意境。其次，是使用典故过多，有时给读者以艰涩之感，失掉了诗歌所应有的谐畅情味。再次，是过份追求句子的对偶及文字的雕饰，有时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并且往往造成有句无篇的不良后果。

尽管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总起来说，他在中国诗史上的贡献还是十分突出的。正是由于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山水诗篇，才最终结束了玄言诗对中国诗坛的百年统治，开创了

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并对后世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为发掘、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撷取谢诗中的精华部分加以整理，奉献给广大读者，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谢灵运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五言杂诗、尤其是山水诗上，他的乐府诗的成就则远不如他的杂诗，且摹仿的痕迹较重，格调也比较低沉。因此，这次选译，以杂诗为主，共选二十九首，乐府诗只选了三首，聊备一格而已。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省涟水县北）人，家居建康。他出身贫寒，早年过的是“垦畛剿菘，牧鸡圈豕，以给征赋”（鲍照《侍郎报满辞阁疏》）的农家生活。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临川王刘义庆为卫军将军、江州刺史。鲍照献诗临川王，得到赏识，被提拔为国侍郎。这是他第一次步入仕途。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刘义庆去世。鲍照上书临川王世子，自解侍郎之职，返回建康故里。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鲍照曾先后追随过衡阳王刘义季、始兴王刘浚，担任过王国侍郎之类的官职；也曾做过海虞（今江苏省常熟县东）、秣陵（今江苏省江宁县）、永嘉等地的县令；其间曾两度客游江北。宋孝武帝

刘骏大明六年（462年）秋七月，临海王刘子项为荆州刺史。鲍照为临海王前军行参军，掌知内命。不久即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八年闰五月，孝武帝死，前废帝刘子业立。次年十一月，前废帝被杀，明帝刘彧立，改元泰始。泰始二年正月，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称帝，临海王举兵响应。八月，刘子勋兵败垮台，临海王被赐死，鲍照在荆州城中被乱兵所杀，终年五十三岁。

鲍照的一生，没有享受过什么高官厚禄。他所做的，都是些王国侍郎、县令之类的下层小官，并且每次都做不长久。可以说，他这一生，基本上是在仕途蹭蹬、穷困潦倒中度过的。

南北朝时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门阀士族阶层，他们任用人才的标准，不是学识才能的优劣，而是出身门第的高低。贵族出身的士族子弟，世袭着祖、父辈的爵位，坐高官，享厚禄，生活穷奢极欲；像鲍照这种“身地孤贱”（鲍照《拜侍郎上疏》）的寒门学子，因为政治上没有强大的靠山，经济上没有优裕的来源，加上门阀士族贵族的压制，就只能屈居于统治阶级的最低层，处处受到压抑与欺凌，一生都在贫苦潦倒中度过。对此，鲍照曾满怀忧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叹息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

鲍照的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使他在文学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和谢灵运不同的道路。他没有在贫困卑贱的处境中一味地消极避世，像谢灵运那样寄情于山崖水泊，而是积极地投身社会，把一腔有志不能伸的郁郁不平之气化而为诗，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暴露黑暗统治的乐府诗篇，成为南北朝时代最杰出的乐府诗人。

萧涤非先生说：“盖乐府本含有普遍性与积极性二要素，以入世为宗，而不以高蹈为贵。以摹写人情世故为本色，而不以咏叹自然为职志。……鲍照位卑人微，才高气盛，生丁于昏乱之时，奔走乎死生之路，其自身经历，即为一悲壮激烈可歌可泣之绝好乐府题材，故所作最多，亦最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评论。

鲍照的乐府诗，继承了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描述。他的乐府诗，大多是描写贫贱者的悲愤、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如他的《代东武吟》，写一个年老被弃的士兵报国无门的痛苦；《代放歌行》，对比描写了不愿入仕的旷达贤士和热衷利禄的齷齪小人，并以正言若反的语气，深刻地揭露了贵族统治的黑暗与残酷，曲折有力地写出了贤士受压抑的忧愤之情。《拟古》诗之六写道：